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

耿相新 著

HANJI XICHUAN XINGJI

汉籍西传行记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耿相新 著

HANJI-XICHUAN XINGJI

汉籍西传行记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籍西传行记 / 耿相新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68-7028-3

I. ①汉… II. ①耿… III. ①汉学—历史—西方国家
②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207.8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2579号

汉籍西传行记

耿相新 著

责任编辑 卢安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程 跃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028-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欧藏中文文献散记

001

汉籍英伦行记

061

《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

137

欧藏中文文献散记



2012年10月2日 罗马

经过11个小时的空中阅读，终于来到了罗马。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恺撒大帝与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可以怀念的，但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话题，他们对明末以来的中国产生的影响至深至远。

传教士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他们又给欧洲带回了什么？这座交流的桥梁充满了欲望，它是如何搭建的？几乎可以肯定，这座桥梁曾经坍塌过，他们为何要自毁坚固的基础？

文化很容易滑向傲慢。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这一点。我想追寻的是我们如何在历史的废墟上重新生长。在了解西方的同时，也要了解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了西方。

2012年10月3日 晨4:00

时差带来了一段空闲的时间。现在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下

历史与现实了。

现实是我此时居于罗马郊外一所教堂学校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公寓里。因是夜里至此，周边是否古老便无从谈起，但在去披萨店的路上，还是可以嗅到她极具魅力的历史气息的。

历史，于我有时是目的，在我研究它的时间里。但，历史肯定不全是目的，未来才是。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

意大利的名字和我在飞机上所阅读的书籍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罗明坚（Michele Ruggier）、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郭居静（Lazarus Cattaneo）、熊三拔（Sabathin de Ursis，以《泰西水法》而知名）、艾儒略（Giulio Alèni，被誉为“西方孔子”，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颇有名）、毕方济（Francesco Samb）、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等这些响亮的名字，陪我度过了漫长的空中之旅。我将手边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与《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对读，让我更感受到了这些人的不凡之处与那些书的不凡之处。

以上这些人都是耶稣会士的杰出人物。罗明坚、利玛

窦是开拓中国教区的先驱人物。尤其是利玛窦，他穿儒服、说流利汉语、写中文著作、绘世界地图、进鸣时钟等，这些“适应”政策敲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利玛窦不仅是传教士，而且还是意大利首位杰出的汉学家。

其后的卫匡国在欧洲的影响主要来自三本书的出版。《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记录了清兵入关并入主中原的历史。1654年，安特卫普出版，8开本、16开本；1654年，德国科隆出版，12开本；1654年、1655年，罗马出版，12开本；1667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12开本；1667年，法国里昂出版，法文译本。由此书的多次再版，可见卫匡国这本书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

卫匡国的《中国历史》一书1658年出版于慕尼黑，1692年被译成法文。而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中国新地图志》（两卷，图17，附说明，171页，16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该书甫一出版，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卫匡国（1614-1661），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入华，他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1650年曾被选为会计员而重返罗马。《中国新地图志》就是在他返回途中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1657年又返回中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的倾心。无疑，卫匡国同样是意大利历史上的杰出汉学家之一。

稍晚一个时期的意大利人殷铎泽（Prosper Intoreetta，

1625-1696)，随卫匡国同船于1659年入华。他的最大贡献是将《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西文并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子》。

天主教的耶稣会为沟通中西文化，不仅是筚路蓝缕的拓荒者，还是将交流引向深入的首倡者和推动者。上面所说的成就大多数是由意大利人完成的。

在耶稣会传教时期，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是传教士中最具有个性的一位。他主要在山东传教，并为试图解决灵与肉问题的勇敢实践者，同时又是最具觉悟要将中文语言学习放在欧洲的倡导者以及勇敢的实践者。他在那波利（Naples，又名那不勒斯）创办了中文学院，并带了一些中文图书与学生进入意大利。这些中文图书至今还藏在那波利大学，那波利大学图书馆至今仍是意大利藏中文图书最多的图书馆。目前，意大利汉学有三个重镇：罗马大学、那波利东方大学、威尼斯大学。而那波利东方大学就是马国贤1732年创办的，其前身名为中文大学，这是意大利最古老的汉学中心。关于对马国贤的兴趣，在前一段所写《〈三字经〉与西方传教士》一文中已经揭开序幕，但对他所办的中文语言学院以及他所带来的中文典籍，迄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意大利中文书籍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那波利

东方大学图书馆也藏有马国贤带来的古籍。据意大利汉学家兰乔蒂说：“威尼斯Fondazione Giorgio Cini的私人图书馆有大量的中国古典书籍和微缩胶片，ISMEO在罗马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国书籍和微缩胶片。”而在二战结束时，兰乔蒂则说：“藏书极其缺乏，在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有一定的古典藏书，但对于严肃的汉学研究而言还远远不够。”

我的初步了解是，意大利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并不多，而罗马最有特色、最有价值的文献则是传教士档案，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Jesu，缩写ARSJ）所藏文献最集中的是耶稣会的中心档案馆。耶稣会曾在全球建立了近百个传教会省，这些会省每年要向罗马总会提交“年度报告”，同时传教士个人还写了大量书信，以及对某个问题撰写的陈述性文字材料，这些几乎都是手稿形式存留下来的。1773年，耶稣会一度解散，这些手稿则分藏各处，待耶稣会重新开始活动时，总会要求各分藏单位将这些手稿交给罗马总会，但有些藏家并没有严格执行，所以，至今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并非全部档案。但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个档案馆所藏文献无疑是最有价值的。

罗马耶稣会档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540年至1773年间的老修会档案，信件超过4000封；第二部分是1814年耶稣会恢复之后的档案，书信超过2000封，但其他档案材料超过前一时期；第三部分是耶稣会总会长档案，是各地传教士直报总会长的书信以及个人论著。还有一部分是一些返回罗马的传教士所携的当地出版的书籍，总量不大，涉及中文古籍有数百册，这部分书籍可进行重新整理，但不需要重新点校出版。为什么他们要携带这些书籍并将其献给总会长，则需要从书籍史角度、传教士角度与文化史角度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也许这对于理解耶稣会的传教行为以及传教士的个人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中文文献目录，已由美国旧金山大学陈伦绪（Albert Chan）著录，他所撰写的《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文书籍和资料（日本-中国卷1-4）：目录和介绍》

（*Albert Chan.J.,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Japonica-Sinica I-IV,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rpe, 2002*）一书已于2002年在纽约出版。该书所著录的出版物有580种，其余则是手稿。该书的出版对推动天主教的研究大有裨益，但如果从书

籍史和出版史的角度去研究，对天主教的发展史则应换一个视角去理解、去审视、去阐释。

中国台湾自徐宗泽、方豪以来对耶稣会的研究颇为重视并学术传承赓续不断。这批档案材料方豪早就予以关注并加以利用，他所著《中国天主教人物志》中就引用不少档案文献。台湾利氏学社影印出版《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12册），就是近年来较成功地利用这批文献的成果之一。

上午9:15 余东 馆长马西尼

上午去拜访梵蒂冈图书馆，这是我们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大象出版社自2008年开始即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商讨合作出版“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文文献”，这也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一个重点资助项目。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确定出版方式和合作方式。

梵蒂冈图书馆馆长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和一位副馆长以及余东女士接待了我们。这个项目主持人为张西平教授和罗马大学的裴佐宁（Ambrogion Piazzoni）教授及马西尼三人。本套书分三辑出版，总计大约在400册。梵蒂冈图书馆方所关心的主要是强调梵蒂冈与大象出版社共同出版，封面、版权页、署名要共同决定。

梵蒂冈图书馆

会后我们参观了梵蒂冈图书馆。“该馆是从15世纪开始修建的。1475年开始对学者开放，之前是教皇私人藏书之所，主要收藏手稿。”我们先进入一个过厅，厅顶上的油画与书均有关系，绘有两个造纸作坊。入门进入正厅，是由西斯廷五世建造的，由六根方柱支撑，大约1000平方米，是非宗教场所中面积最大的。

左边一面墙绘的是有关图书馆的历史。绘有摩西、亚历山大、梵蒂冈早期图书馆等。右边的墙上画了主教历次会议。柱子上画的是当时认为的文字发明人，有传说中发明希腊文的神、发明俄文的人以及希腊的哲学家。

穹顶四周边沿是当年罗马的景观，其绘画与当年教宗活动均有关系。当时圣彼得大教堂建筑还没有穹顶，方尖塔还未建，建筑师向教宗献上建筑方案的油画放在入门右手的墙上。

我们参观完阅览室大厅后，余东女士带我们去任大援先生扫描书籍的工作间；那里十分简陋，但配备的照相机与扫描设备却是十分先进的。随后，我们抵达梵蒂冈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处，在一个玻璃柜内放置着一册早期的手写本的精装《圣经》，一册立在下层，一册打开放在柜子的上层。我

不知道书写材料是纸还是羊皮，但从其参差不齐的书口看，似是纸张材料。向前走到另两件镇馆之宝前，在一个门口的两侧墙壁上分别挂着两巨幅木版雕印图，一幅是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的《坤舆图说》，1672年刻于北京，托裱在绢上，当时是先印于纸上后再装裱的。另一幅是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的《星图》（费赖之译为《赤道南北两总星图》），尺幅与《坤舆图说》相同，也是先分栏雕印于纸上，再托裱于绢上。据余东女士讲，馆内还藏有一幅手绘于绢上的彩色星图，星空绘成蓝色，十分壮阔绚丽。这两幅原图均是裸挂于墙上，今年才装框保护。

参观之后，我提议出去购书，想逛逛书店，一则是看看有没有馆史之类的书籍；再则是看看有没有书籍史方面的画册。余东女士领我们到一楼购书处，在过道的台上放了一本梵蒂冈所出版的图书目录，并没有书籍实物。询余东得知她自己编有一本《梵蒂冈图书馆馆藏早期传教士中文文献目录（十六至十八世纪）》，于是决定买下，并请余东女士签名留念。另购一册梵蒂冈馆史，这是一套书，目前仅出版第一卷，书名为 *Leorigini Della Biblionteca Vaticana Traumanesimo E Rinascimento (1447-1534)*，2010年版。该书所叙内容当是梵蒂冈教宗个人藏书时期。

中午邀余东女士一起到中餐馆吃饭，得知余东女士是中国人，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她是梵蒂冈图书馆正式工作人员，已在梵蒂冈工作20年，那里所有中文文献都经过她整理，当是这批文献的保护神。我们这次的出版项目她也立下汗马功劳，令人钦佩。我借机又请教了一些问题：一是终于清楚傅圣泽（Teau Francois Foucquet, 1665-1741）自中国带往西方的中文书籍现在均藏在梵蒂冈图书馆，有文献记载称傅圣泽之书有一部分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也有人认为他将书携至罗马耶稣会传信部（因他自中国返回后一直供职于传信部，直到去世），在这里他接受了主教一职，还有人猜测他与耶稣会脱离了关系。经询问余东女士方得知，傅圣泽的中文书及手稿在他去世后均一并转交给梵蒂冈图书馆。这一疑点，当拨清于后人。二是经询问余东女士获知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编目之第一部分巴尔贝里尼·奥里斯（Barberini Orient）原是一位出版商，梵蒂冈聘他出版一些书籍。当时各省区传教士寄来或带来的书有时会先让他过目，他时而会将珍贵的书留下，这部分是来自他的藏书。伯希和编目第二、第三部分波吉亚·西尼斯（Borgia Siamese）原是梵蒂冈的书籍或者文献登记员，各地所交书均经过他们之手，伯希和编目登记时误将他们的名字写入捐赠或他们个人的藏书，这是一种误解。三是关于《清明上河

图》的疑问，这个摹本一直由清代一位皇子（不知姓名）收藏，其前印鉴较多，但据其中一题说是北宋末年临摹，余东女士推测当不是张择端的真品，而属于更晚时期的一个摹本。余东女士应张西平先生之约，会将梵蒂冈所藏中文书籍之来源写一专文放在《梵蒂冈藏中文文献》书前作为前言，当以余东女士的考证文字为准。

下午3:00，我们乘火车自罗马抵米兰。行程时间为2小时50分。车上，张西平教授谈到荷兰出版商布里尔出版社对整理出版中文文献十分热心，他们已经出版了（用微缩胶片形式）部分中文档案文献。北京外国语大学已经购买了他们整套的胶片。这家公司在北京、上海设有办事处。从出版的角度我们应当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可以将他们出版的胶片还原为纸质，在国内销售。同时，我们也可以将藏于中国的关于欧洲主题的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与布里尔出版社合作。这次欧藏会议他们也将派人参加，并承诺出版本次会议的论文集。

荷兰早期汉学

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其出版业却十分发达，在欧洲享有盛誉。目前活跃于中国的数字出版商爱思维尔就是一